



如何有效增强党性

——读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

□ 张 磊

194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通过后立即在党内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中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作为当时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之一的任弼时率先垂范，于当年10至12月间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以下简称《报告大纲》）。任弼时的这篇文章，是当时对《决定》精神的权威解读。今天学习研究《决定》的精神内涵以及思考如何有效地增强全党的党性，不能不学习这篇重要文章。

弄清党性概念和内涵是增强党性的前提

增强党性首先必须对党性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为了回答党性的范畴所包含的内容，任弼时从三个角度来认识党性。一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的共产党的性质。他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在这里任弼时已经认识到政党的性质与党性之间的关系，就是政党的性质决定党性，不同的政党，具有不同的党性。因此，为了把握党性的内涵首先要弄清楚党的性质问题。二是论述了什么是党员的党性。他认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这个定义里包含了党性的深刻内涵，一般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不是党性，升华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才是党性。同时，在这个定义里包含了党性的阶级性内涵，任何党性都有阶级性。三是任弼时还认识到了党性并不是抽象的，政党的党性必须通过其成员的具体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和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

认识党性、把握党性的内涵奠定了基本前提。

增强党性须紧密结合党的政治路线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之际，党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一是从党担负任务的艰巨性来强调增强党性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当时抗战正处于相持阶段，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掀起反共高潮。在如此异常复杂的环境和艰巨的任务面前，肩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中国国民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自身。因此，他指出，“在今天的环境中，在目前条件下，我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二是指出影响党担负艰巨任务的因素。任弼时从党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基础、党的活动的特点的角度来分析影响党员党性的几个方面。这就要求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要求全体党员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统一整体。这些要求不是凭借党员的自发意识或是个别领导人的觉悟所能做到的，而是建立在阶级觉悟升华的基础上。共产党人的阶级觉悟的表现就是自觉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因此，我们必须紧密结合党的政治路线讲党性，否则就是空洞抽象的。

增强党性须自觉地加强世界观改造

党性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党性的一条基本要求就是“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

我党的最高利益，应该用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为这个利益服务，并且要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这样的阶级觉悟、阶级意识，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在长期的实践斗争中才能达到。任弼时指出：“不管我们的党员的社会出身和社会成分如何，为了具备无产阶级的觉悟性，为了把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首先得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斗争，战胜它，克服它，排斥它。只有这样，新的无产阶级的意识才能容纳得下，才能站得稳，才能慢慢地变成自己属有的东西。”每个党员对于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应具有高度的自觉性，这样才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增强自己的党性。

增强党性的途径

任弼时认为应该从党的阶级性、理论性、党的利益的至高性、党的组织性和人民性等方面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的自觉性。他在《报告大纲》中提出了增强党性的基本途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非常强。

一是共产党员要培养出为党的利益奋斗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他认为党员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并用对党的无限忠诚去为这个利益服务。只有这样，党员才会“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成为自觉的、自动的和积极的”。

二是共产党员要把对马列主义的忠实性和坚定性与灵活地、切乎实际地运用结合起来。他指出，共产党员“要对马列主义（即对共产主义的事业）也得有无限的忠实性和坚定性，无论在学习它的时候，或运用它的时候，都是一样的。然而要

灵活地、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就是说，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不要不顾实际的情况，只唱高调，套公式”。同时，他还指出：“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

三是共产党员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的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党员就得与“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作斗争”。只有这样，党才能成为一个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的整体。

四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守党的铁的纪律、服从组织的决定。这也是判断党员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他指出，遵守纪律就是党员要遵守党的铁的纪律，克服不遵守党的纪律、无组织观念、不服从组织等倾向；服从组织则要求任何一个党员要毫无例外地服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五是共产党员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任弼时论述了密切联系群众对我们党所起的伟大作用。他指出：“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哪个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失掉了群众，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失掉了斗争力量。哪个党员脱离了群众，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说，少联系一个人，便对党减少一份力量。”



袁隆平（1930—202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他毕其一生，专注田畴，播撒智慧，收获颇丰。同时，他的执着治学精神为后人所敬佩。

科研的本质是创新

在治学的道路上，要学习前人先贤、尊重权威，同时也要坚持真理、独立思考、善于质疑、不迷信权威、勇于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行稳致远、有所突破、有所建树。袁隆平堪称“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的典范。

袁隆平指出，科学研究要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这个是关键。搞科研，应该尊重权威但不能迷信权威，应该多读书但不能迷信书本。

袁隆平从小就受母亲“多读书、求进取、做好事”等思想熏陶，刻苦学习，学业优秀。在中学时，他是一个喜欢思考、勤于动脑、善于提问的学生。大学毕业后，1953年8月，他开始了在湖南安江农校的19年教学生涯。针对学生在课内外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自己的疑问，他深入实践、潜心研究。他深有体会地说：“即使浅显的问题，如果教师本身钻研得不深不透，就不可能把课讲好。”

袁隆平说：“科研的本质是创新，如果不尊重权威、不读书，创新就失去了基础；如果迷信权威、迷信书本，创新就没有了空间。”20世纪50年代初期，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在中国盛行，袁隆平曾经很相信这一学说。但他在按照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开展“无性杂交”研究取得一些实验结果、受到赞扬后，对自己的研究提出了疑问，冷静地思考自己的研究课题方向的正确性问题。

袁隆平认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既不能被别人赞扬所迷惑，更不能自己哄自己。经过多年的科学实践，袁隆平对米丘林、李森科遗传学说中的某些观点产生了怀疑，毅然抛弃从事多年的“无性杂交”试验，大胆去探索新路子。

袁隆平尊重科学，坚持真理。他不轻率下结论，也不附和任何权威，而是进行独立思考，进行独立研究和分析。他通过深入研究各种遗传学说，从比较中求真理，用实践去检验，由此闯出了自己的杂交水稻之路，并为中国和世界的粮食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根据实践提出问题

实践是理论之基。袁隆平是一个实践家。他开创的杂交水稻研究事业，靠实践起家；他理论上的一次次突破，也是靠实践推动和实现。袁隆平指出：“我不是那种书呆子，我这个人呢，思想比较解放，比较自由，考虑问题的时候看书。看书呢，一边看，当场汲取他们的经验，一方面还要打问号，这里面很重要的，你专门是死记硬背的，那不行的，你必须根据我们的实践，提出它的问题在哪里。”

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使袁隆平在实践中具有非凡的洞察力。通过实践他解决了“杂交水稻没有优势”的争论；突破了杂交水稻高产优势关；闯过了杂交水稻制种关……袁隆平通过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实践，逐步探索出杂交水稻的一整套技术，攻破了一道道难关，在杂交水稻事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为使杂交水稻尽快应用于生产，袁隆平一方面进行理论概括，用理论指导实践；一方面搞好丰产示范，加速杂交水稻的推广。

靠实践冲破传统遗传学理论的袁隆平，并不忽视理论的升华。他一生发表关于水稻的论著20余篇（部）。1966年，他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1977年，他又发表《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论文，指出：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一是丰富了雄性不育和‘三系’关系的遗传理论；二是否定了稻、麦等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交优势的旧理论；三是给某些其他自花授粉作物的制种技术提供了良好的借鉴。”这篇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上，深刻阐述了杂交水稻育种中几个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1987年，袁隆平发表《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一文，高瞻远瞩地、大胆地、科学地把杂交水稻育种分为

搞科研就是要创新

——袁隆平的研究之道

□ 王恩宝

互相衔接的3个战略发展阶段，即三系法为主的品种间杂种优势利用；两系法为主的亚种间（籼、粳）杂种优势利用；一系法远缘杂种优势的新的战略设想，很快得到国内外科学家的一致公认，有人称之为“袁隆平思路”。科学理论的发展犹如登山一样，高峰叠现。袁隆平从《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到《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再到《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设想》，就是他理论发展的一座座高峰，只是每座高峰的高度和视野不同而已。

耐得住寂寞

在许多科学家身上，都具有“板凳须坐十年冷”的“耐得住寂寞”的顽强素质和踏实执着的治学精神。这种素质和精神是一种博大的情怀。这些人长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经常是一个课题研究十几年、二十几年。支撑着他们永不放弃的，就是科学研究的执着精神和造福人类的梦想追求。

袁隆平指出：“我们一生有很多东西需要坚守，如果浮躁了，就难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成功没有捷径。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这从一定角度体现了他对事业、对科学研究“耐得住寂寞”的品格和执着精神。

袁隆平说：“我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只要田里有稻子，从播种到收获，每天都要下田，这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我的兴趣。”袁隆平这样说，是放在他所从事的事业上衡量，第一位的是做科学研究，这是他认可的自身价值的体现。

袁隆平的观点也从另一个角度诠释了科学家应该具备的良好素质，即“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是一种素质，更是一种执着精神。“耐得住寂寞”正是袁隆平执着治学精神的具体体现。袁隆平赢得“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荣誉称号，靠的正是这种良好的素质和踏实、专注、纯粹的治学敬业精神。他用毕生精力和智慧突破经典遗传理论的禁区，提出水稻杂交新理论，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他功成名就之后，并没有坐享已有的荣誉，又继续投入超级杂交水稻实验。从投身水稻事业一直去世，他始终孜孜不倦地忙碌在田间、实验室，用行动履行着他在荣获终身成就奖后关于“终身成就奖就是要奋斗终生”的承诺。

袁隆平说：“我毕生的追求就是让所有人远离饥饿。”“耐得住寂寞”沿着这一目标执着向前就是袁隆平的治学精神。



“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

——读〔美〕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

□ 吕锡月



D·包瑞德（1892—1977年），出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美国军人，1924年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随员，1944年作为美国军事观察组组长赴延安，成为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正式联系的见证者。美军观察组延安一行可谓一波三折，其间多次受到国民党阻挠，所以美国各界对观察组寄予厚望，他们迫切地想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包瑞德作为观察组组长深感责任重大，在延安细心观察之余，也有随手写作日记的习惯。这促成了包瑞德在离开延安20余年后写作《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70年在美国出版。《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详细介绍了美军观察组的由来以及在延安的工作与生活，追述了当时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访问延安始末，总结了包瑞德视角下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尤其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状况作出了充分的解读。

中国共产党人是“优秀的游击战士”。包瑞德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总体评价是“优秀的游击战士”。首先，从观感上来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军容仪表、精神状态明显好于国民党军队。其次，从具体问题出发，包瑞德惊诧于中国共产党军事情报的工作效率。书中提到“东京报纸

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这些情报对我们小组的成员是有用的”。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军队积极帮助美军搜集天气预报，给予美军很大的帮助。这些中国共产党军队力所能及的工作很好地配合了美军的行动。最后，从宏观上来讲，包瑞德十分认可中国共产党军队对日作战的态度。因此，包瑞德提出用美国装备援助中国共产党军队，以便让中国共产党军队可以更充分、更全面地配合美军对日作战。书中很好地表现了包瑞德对两支军队合作的憧憬，“如果他们有更好的装备和供应并接受美国军事顾问的帮助，那么他们在对日作战中就一定能取胜。”

“那里的一切事物所具有的外貌是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赞同的”。包瑞德在延安的生活无疑是非常愉快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给包瑞德呈现出平易近人、友善和谐的印象。包瑞德在书中提到“在延安，我所见到的任何地方，包括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部，都没有一个卫兵”。比起重庆处处军警的压抑，包瑞德自然更喜欢延安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氛围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状况作出了充分的解读。“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他经常是步行”，以至于让包瑞德感觉“如果有什么人打算暗杀毛泽东，在我看来似乎是非常简单的”。而事实是毛泽东非常安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心所向，根据地人民的普遍拥护就是毛泽东最好的安全保障。延安的生活看似物质上贫瘠，但精神上却十分丰富，包瑞德经常被邀请到称做

“梨园”的果树林里去跳舞，即使“很难找出能够演奏舞曲的音乐家”，但包瑞德还是认可了舞会所烘托出的革命乐观主义。他在书中提到舞会“给所有的共产党军队带来愉快，也可能给美国人带来好处，并且这些好处是无法估量的”。总之，包瑞德在书中热情洋溢地回顾自己在延安的生活，物质上的缺乏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上的富有，而这种以精神富有为特征的生活模式征服了包瑞德。

“正在尽一切可以预料的努力与日军战斗”。抗战时期大量外国人反馈了在延安的见闻，毫无疑问，他们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朝气蓬勃、蒸蒸日上，一改对中国共产党的偏见。于是，美国驻华的外交人员中形成了一种比较普遍的认知，他们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带引号的共产党”或“所谓的共产党”。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体现的对人民负责、全力投入战争、根据地治理能力等等方面，都是西方视角下的进步行为。就像包瑞德感慨于共产党军队“正在尽一切可以预料的努力与日军战斗”，条件艰苦并未削弱共产党人抗击侵略的意志，包瑞德也被这种坚定的斗争精神打动了。于是他愿意以朋友的心态和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书中详细介绍了包瑞德视角下美国总统特使，后为美国驻华大使的赫尔利访问延安这一重大事件。生活中平易近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赫尔利的谈判中一改往日的亲切，表现得十分强硬，赫尔利甚至提到毛泽东“捉弄”了他。而包瑞德虽然也认为赫

尔利自从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为政党私利出卖人民利益，更不可能拿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为筹码，充当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稳健分子”。实际上，谈判桌前的强硬与抗日战场上的坚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体现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毫不妥协的态度。包瑞德感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却不解于中国共产党人谈判桌上的强硬，但他仍旧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人”。

包瑞德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建立官方联系的重要参与者，这让《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作为包瑞德回忆延安见闻的作品更具史料价值。尤其是包瑞德作为美国现役军人、观察组组长的身份使他要以对工人认真负责的态度去描述在延安的见闻，所以包瑞德能自觉抑制个人感情，更客观、直接地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成就。此外，他在书中对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现状、发展的描述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官方态度的重要参考依据，这进一步增强了《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史料价值。

无论从包瑞德特殊的身份出发，还是从美国官方急于全面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出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视角与其他外国友人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回忆有所不同，这种视角的特殊性使《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在反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团结力量这段历史时更具说服力。